

卡累爾省	I. I. 謝尼金 Senkin	五一歲 一九四〇年入黨	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齊米梁在卡累爾省任第二書記及第俄共第二十二屆檢委 車夫農業研究院畢業 一書記共十一年歷史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參加蘇軍
莫斯科省	V. I. 科諾托巴 Konotop	五十歲 一九四四年入黨	在哈爾科夫機械機器建設學從莫斯科區黨部第一書記，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 院畢業 省黨部第二書記，省黨部第一書記共十四年歷史	
庫爾干省	G. F. 西索夫 Sizov	六十三歲 一九六二年入黨	一九三〇年在齊米梁車夫農業研究院畢業 在庫爾干省任第二書記及省俄共第二十屆及第二十一屆候補中委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及第十二屆候補中委 一書記共有十四年歷史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參加蘇軍

從以上俄羅斯共和國十名連任省第一書記分析後，獲得下列特點：○此十名省第一書記之年齡從三十八歲至六十三歲，屬於俄共第二代人物；○在一個省份担任黨務工作最少五年，最多十四年；○多曾受工農業專科及大學

教育并曾在俄共中央高級黨校受訓；○在德蘇戰爭時多數曾參加軍事工作。此批資深的各省第一書記，在布里茲涅夫政治地位尚未鞏固之前，仍需要彼等之支持。

日俄走向合作的經濟會議

張棟材

一 照預定舉行了首次會議

日、俄之間於去年夏當日本「鋼鐵代表團」及「經濟代表團」先後訪俄時，曾決定下雙方致力經濟合作的步驟為：成立「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機構；並預定今年三月間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討具體實施內容。其後，雙方乃立行展開籌備工作，日俄間的友好接近傾向亦益見顯著，如日外長椎名悅三郎即曾於今年初應蘇俄邀請前往莫斯科作爲期一週之訪問，且獲致下列諸項成果：○簽訂日俄航空協定，預料今年六月間即可實現多年來所希望的東京與莫斯科間之班機通航。○簽訂日俄新貿易協定，此項協定爲規定期間五年之長期性者，對擴大貿易有推進作用。○關於日俄正在談判中之領事條約，雙方同意及早使其達成協議，並約定由俄外長葛羅米柯答訪日本時簽訂。

○關於日本漁船在齒舞、色丹附近捕魚作業之安全問題，俄方已允諾從善處理。○雙方主張進一步發展兩國政治家之間的聯繫，不時就共同有關事項進行磋商。

在實質上負有促成日俄走向經濟合作任務之「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已準確地按照所預定時日於三月十四日至廿三日在東京舉行過。蘇俄這一次派至日本的代表團，規模相當龐大，團長係由俄商會主席奈斯特羅夫担任，團員則有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謝米恰斯特羅夫、森林造紙和木材加工業副部長巴拉庫辛、海運部副部長卓托夫、石油開採部副部長奧爾科夫、石油輸出協會主席古羅夫等共計二十八人。日本方面在事前曾特爲此項會議鄭重其事地組有由六十一人而成的「日俄經濟委員會」，又從這六十一人中再選出包括全財經界巨頭在內的三十五人任出席代表，如日商會會長足立正，經團

聯會長石坂泰三及副會長植村甲午郎，貿易會會長稻垣平太郎，富士製鐵會社社長永野重雄等，這都是十足的實力派人物。此外，尚有政府派出的外務省、通產省、經濟企劃廳等高級官員代表參加會議。就雙方的代表陣容以及會議內容來論，那在日俄外交關係上是堪稱空前盛舉的。

會議的主題，其實只是蘇俄要求日本協助開發西伯利亞的問題。這原是一件舊案，過去被人視為紙上空談的遠期構想，現因蘇俄所提出的新五年計劃即係以開發西伯利亞為重點，而且將計劃方案送到日本面前，却大有逼着日本非答允協助不可的氣勢。因之，這個「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機構的會議，就更加重了日本與俄經濟合作的被動性。

二 日俄經濟會議之背景

日本與外國舉行所謂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方式，以求促進經濟關係，這並不稀奇。日本藉此類方式會與美、英、法、加、意、印諸國召開過多次，在預定中的尚有將於最近與澳洲、墨西哥等國舉辦此類會議。但這些國家都是屬於自由世界之一員，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加強彼此間的經濟關係，它根本不會發生是否危害到自由世界的疑慮。今天日本卻以原係自由世界敵對者的共產政權——蘇俄為合作對象，這便牽涉到它的後果究將引起何種影響的問題了。

何以會產生日俄走向經濟合作的此項機構與會議呢？三月十四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社論中，曾對此坦率地指出：「不言而喻，其背景是由伴隨着東西緊張局勢緩和而來的日俄之間政治友好氣氛，以及兩國憧憬擴大經濟交流的共同意圖所構成。」這可以說是已很清晰地描繪出了日俄經濟會議的背景，而且此一認識是符合客觀事實，也代表了日本朝野的普遍看法。所以，日本的各方輿論幾一致地根據了對該項背景的認識，作更深入地分析日俄經濟會議的趨向。歸納起來可有下列諸點：

一、認為此一會議不僅對今後日俄兩國貿易擴大、經濟合作能有極大助力，且將在增強兩國政治、外交關係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日本外務省推斷此將為日本的安全保障賦予有利結果。

二、認為日與俄經濟合作，能減輕蘇俄對日之壓迫威脅，換取鞏固日美安保條約之體制。其論證為當椎名外長訪俄時，俄外長葛羅米柯會向其聲稱

「日俄關係之友好發展，並不損及日本與第三國（意指美國）之關係。」是以佐藤首相即向國會公開聲明：蘇俄之接近日本，證實了日美安保體制的正當性及其和平性格。

三、認為日俄經濟合作是美俄合作的變種，它是在美國策劃包圍共匪的要求下進行的。日本如能善於利用共產集團內匪俄衝突的情勢，藉與俄從事經濟合作的戰術，可達成遏制共匪與削弱共產集團力量的雙重目的。

四、認為佐藤內閣原訂有與共匪擴大經濟關係的計劃，但受制於美國的圍堵共匪政策，短期內無法實施。因而惟有乘勢利便，以蘇俄為共匪替身，作為對內外施政的交代。國際的大形勢已註定了日俄必然增進經濟合作的歸趨，蘇俄針對此點卻首先掌握了攻勢，使日本欲罷不能。

蘇俄在日俄經濟會議開幕前夕（三月十三日）曾強調此一會議的意義稱：「這次會議的舉行不只是自然的，而且頗得時宜。」布里茲涅夫在俄共廿三次大會的工作報告中也特別提到對日關係稱：「日本與吾人之關係，最近有若干積極的轉變，正向着相互有利的經濟結合發展。」這都充分說明了蘇俄型的現實、利害外交運用已到可倖取收穫的階段。現在蘇俄所尚存恐懼的則是共匪在一旁不停叫囂，處處要想法拆穿並破壞俄、日關係。共匪於二月二日之「人民日報」及十一日號「紅旗」曾分別發表大肆抨擊蘇俄之「蘇聯領導同誰聯合行動」「蘇共新領導奉行蘇美合作路線的供狀」兩文，其中都譴責了蘇俄接近日本的行動，如謂：

一、「蘇聯領導人竟然恭維日本反動派是『亞洲的安定力量』『在亞洲居於領導地位』，甚至希望日本反動派同蘇聯『在國際社會上採取密切的聯繫而行動。』蘇、日莫斯科會議的結果，兩國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協定。」

二、「蘇聯領導人如此迫不及待地追求同日本反動派的合作，是同美帝國主義加緊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密切配合的。」

三、「蘇共新領導的蘇美合作路線，一個時期以來又擴展到了蘇日合作方面。蘇共新領導實際上承認了日美軍事聯盟，並且要搭上自己的一股，搞一個蘇、美、日聯盟來反對中國。」

共匪的這套論點，正連續地宣傳着。它的既反美、反俄而又附帶加進反日的新動向，只要能激起日本在對俄政策上不得不顧忌、考慮到共匪的態度稍現徬徨與遲疑，便是能收分化效果的一個起點。蘇俄深知共匪在離開日、

俄關係的謀略中，如以中國大陸市場向日展開利誘競賽；以日俄間領土懸案的矛盾乘機煽惑；以日本內部親匪之日共與左傾勢力挑發反美、俄運動……等等，它仍然具備着遠超過蘇俄之優勢條件的。

三 會議的初步結果

共匪報紙曾諷刺蘇俄把自己所編制通過的新五年計劃都已覺得「不能算數，還要拿到東京的『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去研究。」其實，蘇聯之能引起日本提供經濟合作的興趣與信賴，主要就是由於巧妙地拾出這個新五年計劃的一塊招牌。俄總理柯錫金於去年夏曾向訪俄的日本兩個代表團當面促請提出協力蘇俄新五年計劃有關開發西伯利亞的方案，這一着才使日本感到蘇俄對日本確有誠意，逐漸烘托出日本國內對俄友好接近的氣氛。

此次日俄經濟會議一開始，便首由俄方代表團詳釋新五年計劃中開發西伯利亞與遠東的內容，接着雙方就以大部份時間商討俄方所提要求日本協力合作的提案。從俄方提案內容看，那也正如共匪方面對其開發西伯利亞計劃的評語：「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準備資源和產品換取資金和技術，大搞日蘇合作。」

石油是蘇俄對日的一個最有力的誘餌。照俄方的提案所稱：西伯利亞油田的推定埋藏量為四百億噸，在十五至十五年內即可成為蘇俄之石油供應中心地帶。目前已發現者達十億噸，預計今後五年內將再發現三十億噸，現最需要投資者為敷設輸油管、構築鐵路、整備港灣及電信設備，這些都期待於日本作長期投資的合作。特別是關於敷設輸油管線路，蘇俄計劃的兩條線路合計全長七千七百六十公里，需鋼管兩種（一為口徑千二十米厘；一為口徑七百二十米厘）約百萬噸，希望完全由日本供應，其價款則待將來以出產之石油分期抵償。據俄方之說明稱：該項輸油管線路完工需時三至四年，屆時可有一年間達一千萬噸之輸送力，此恰為日本所需要之數量。不過，蘇俄也同時附帶了兩點聲明：一是西伯利亞油田須在十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始能有輸出餘裕；另一是分期折付的抵償期間要長達二十年之久。

像這樣苛刻的條件，已經是超越了國際間經濟往來的常識之外，這不是「合作」，而是「援助」。蘇俄的如意算盤還動念到以西伯利亞的大量過剩木材換取日本的各種成套工廠設備。

日本財經界與政界的實力者，對於與蘇俄從事經濟合作一事，大致可劃分為消極論與積極論兩方。消極論的觀點是嫌俄方要求過奢，如僅以開採石油與輸油管之一項投資即將達二十億美元之鉅，且屬長達二十年之投資，實冒極大風險；更認蘇俄經濟本質為自給自足經濟，一旦奠定自給體制，雙方經濟交流即有中斷之虞。而在積極論方面的主張，則引最近西德為共匪興建鋼鐵廠為例，認為日本如不與俄合作，自將為英、意、西德等國所取代，故為求擴大對俄貿易計，縱條件過苛，亦應本開拓市場精神忍痛以赴。這兩方的觀點均有依據，因之就難作何勝何負之決定，此一情形也就是使此次日俄經濟會議對上述俄方提案未能作立即應諾的原因。但這並不意味着日俄走向合作的經濟會議是失敗了的，蓋後者的主張支配着今天日本財經界人士的理想；在另一方面，蘇俄的提案牽涉到禁運問題，數年前便曾經發生過北大西洋公約阻止日本以鋼管輸俄的事例，對於這種屬於戰略物資能否輸往共產集團的問題，事實上也不是日本所能擅自決定的，還有，蘇俄也並未忘記對日的小惠政策，它會同樣提出以分期付款式向日輸出飛機、壓路機、醫療機械、農業機械、特殊工作機械等物來挑引日本的對俄好感。

會議結束後，日方的代表們異口同聲地在稱：「已收到所期望之上的成果，如此充實之國際會議，尚屬罕見。」俄方代表團團長奈斯特羅夫則謂：「日俄經濟交流自此已進入一新的階段。」在其共同聲明中所反映出來的會議結果，可列為下述兩點：

一、雙方要合力推進五年長期的新貿易協定，並求經濟合作構想之具體化，這其中自然要包括有關開發西伯利亞在內，亦即為今後仍將繼續研議。

二、日本與蘇俄經濟合作的第一步將為投資開採庫頁島之天然瓦斯及西伯利亞之銅礦，先行派遣技術調查團從事調查。

繼日俄經濟會議之後，本年十一月在日本大阪又有蘇俄工業展覽會之舉行。蘇俄現已透露屆時將由副總理巴伊巴可夫率領一大規模之訪問團來日，按巴伊巴可夫係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為石油專家。蘇俄此舉之用心不問而知，仍然在誘導日本應允協力開發西伯利亞的油田與輸油管的投資，期使此一代表團與日方的接觸等於另一形式的「日俄經濟會議」之延長。總之，「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這一個機構與會議，已形成為雙方走向經濟合作的渠道，日本在今後將迷茫地、不由自主似地被拖入這渠道，則是可以

預見的。

四 結 語

當前盛行以蘇俄爲範例倡論共產政權發展至某種程度後，即必然發生質的變化，故可與其和平共存之說。其始作俑者爲美國，日本則是被影響的一個。「日俄經濟聯合委員會」機構與會議，乃是日本基於此說的第一次嘗試。

關於共產政權是否會由內部發生質的變化而能容許他人與其和平共存，這是一個極待澄清的問題。就歷史的與現實的冷酷教訓觀察，都無法證明共產政權的暴力本質有何變化。共匪的猖狂是不必說了，即以蘇俄論，它除去避免核子大戰外，對其鼓動世界革命亦即征服世界建立共產大帝國的企圖，固並未有絲毫停止進行的跡象。它和共匪的區別，只是變得更現實、更冷靜，換句話說：乃是更狡猾與陰沉而已。我們有理由相信：共產集團的對外擴張侵略，依然是威脅自由世界以至全人類生存自由的敵人。單是根據此點以觀日本與蘇俄經濟合作的妄念，便知這不僅是絕無必要，也是害人不利己的愚行。

不過，現在所幸日本也並未失去理智上的審慎與警戒，所謂日俄經濟合作亦還未完全成爲定局。在日俄經濟會議之後，日本於四月六、七兩日在東京又召開了「東南亞開發部長會議」，這兩項會議對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對照，考驗日本如何選擇何者爲適當的應加援手的對象。

日本邀請參加該會議的國家有九國，除緬甸未與會外，泰國、菲律賓、寮國、馬來西亞、星加坡、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均參加。這是戰後日本在極力倡導亞洲人的團結而願以資本技術有所貢獻的一次成功的國際會議。共匪會攻擊此一會議爲「日本壟斷資本以對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爲名，進一步加強經濟侵略」，但這反而更足證明此一會議的意義，恰如日本「每日新聞」(四月八日)的述評專欄所稱：「政府方面並不畏懼來自共黨政權之責難，蓋已堅信應與東南亞諸國協力克服經濟貧困以謀政治安定。政府認爲這次的會議，往長遠看，對防遏中共向東南亞的滲透，將能收效。」

去年四月間當美總統宣佈「十億美元開發東南亞構想」時，日本會即表示「應採取主動接受這個構想」，並亦立即籌開「東南亞開發部長會議」，

其延緩到今天始能召開，自是日本經過一番奮鬥得來的，最主要的一點還是由於共匪之對亞、非活動節節敗退，東南亞若干國家已不再專伺共匪顏色的緣故。日本稱此一會議將生防遏共匪滲透效果，這不是誇張，共匪的反應已對此作了答案。

在這個會議中，日佐藤首相提出了諾言，謂今後日本決積極協助東南亞諸國之經濟開發；三木通產省大臣則指出了以日本經驗爲參考的工業化正當途徑；須重視農業基礎與輕工業，福田財政大臣列舉了一九六四年日本對外援助數字而聲明了對東南亞援助總額將擴大爲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一，這些都使與會國家對日本的誠意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會議決定了明年在馬尼拉召開此一會議，可見這已經成爲一個常設的機構會議。此外，並將定期召開「東南亞農業開發會議」；設立「東南亞經濟開發促進中心」來研討合作的確實計劃；設立共同出資的「船舶公司」「漁業調查中心」「東南亞運輸機構」，均係切合實際而可行之事。共同聲明中在論及促進工業化一點上首先強調以鄉村電氣化及開發地下資源，更表現了這一個由日本所主導的會議已具有不尚侈言的平實穩健作風。

日本苟能真正遵循這個會議的決定與作風去致力，這正是洗刷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遺留的侵略殘跡；及爲其倡導亞洲人的團結而立信的大好機會。若將此一會議與日俄經濟會議的內容作一比較，顯然是日本自陷於矛盾與自尋困惑。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日本實在沒有協助蘇俄共產政權執行新五年計劃的義務。但日本享有經濟復興與繁榮，則是蒙自由世界大環境之利(雖然是日本自身努力的結果)，日本卻有對低度開發地區非共國家援助的責任。

日本在應盡的責任上並未盡責，所以只給人以惟利是圖而自私的印象：已故之池田首相曾被人譏爲「販賣電晶體收音機之商人」；某亞洲國家辱稱日本人爲「經濟的動物」；聯合國貿易會議席上則公開指責過日本對低度開發國家之援助，過於漠不關心……這類事例，都值得日本檢討反省。

「日俄經濟會議」與「東南亞開發部長會議」在同一時期並均在日本先後舉行，這等於是擺在日本經濟外交面前的兩條南北異轍的道路，日本究竟要選擇那條路呢？依吾人觀察：日本是兩條路都不想放棄，一步一步地試探着推進。